

万安丛书

学界宗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商鴻達

王 力

李景漢

姜椿芳

黎 澍





邓郁文

张寿康

孙敬修

陈士林

李欧丽阁



序

殷兆玉

公墓作为人生旅程最后的归宿之地，不仅仅是安葬死者，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人们与逝去的亲人之间维系感情的纽带。作为社区设施组成一部分之一的公墓，也是文化传承的场所。因此，公墓不应该是人们想象中的荒草野冢、白骨遍野的恐怖景象，而应该是一个充满浓厚文化氛围的地方，公墓本身所包含的文化特征，自有它独到之处。人们对死者的有形的怀念，除了文字、图像之外，就要算是墓地了。无论是怀念、忆旧、伤感或是告慰先贤，墓地最容易令人触景生情。

所以，任何一个公墓都应该有它独特的风土文化景观。

位于北京西郊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创建于1930年，已有万余人在此安息，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公墓。之所以说她是现代公墓，是区别于“公共坟地”而言的。公共坟地，既包括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家族墓地，也包括慈善性质的、以区域为限的义园义地（如北京历史上的广东义园、东北义园等等）甚至乱葬岗子。《北平香山万安公墓章程·缘起》中说：“公墓之组织，其制创自欧西，实较吾华族葬为完备。”可以说现代公墓出现是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小小的实例，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它同时还保留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

在万安公墓，它的管理设置和建筑风格乃至墓式设计、碑

石雕刻已有 60 余年的历史。创始之初，选择了京西风景优美的地理环境。并在《北平香山万安公墓章程·缘起》中神秘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可以说这也是 60 多年前历史的遗存。

以史为鉴，以史育人。60 余年来，由于墓址的优越，这里安葬了众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身后落叶归根的港澳台同胞，公墓也因此而蜚声海内外。这些人物在过去的时代里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以相当的影响。我们公墓管理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将他们一生活动的精彩部分记录下来，留存下去。过去已成为历史，未来也将会成为历史，《万安丛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将安葬在万安公墓的、对社会进步与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物，扼要地记载下他们一生的主要事迹，以供后人学习。

而且，许多年来，万安公墓自身建设也在迅速向前发展，随时代进步而进步，我们希望将这里建设成为永安逝者和人们怀古凭吊、怡心赏目的休闲之地。这里的碑刻铭文、书法艺术乃至园林风景也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代表作。万安公墓作为国家和市、区文物保护单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万安丛书》的编辑出版将为读者奉献一份有益而翔实珍贵的史料。

目 录

序.....	殷兆玉 (1)
学者之路	
——商鸿逵教授传略	商 传 商 全 (1)
王力传.....	王缉国 (23)
追记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家李景汉	
.....	李美格 (71)
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之父	
——姜椿芳传略.....	姜尼娜 (84)
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黎澍传略	陈文桂 (114)
难忘父亲	邓 伟 (135)
受人尊敬的园丁	孙全来 (151)
“友谊大使”李欧丽阁.....	李美格 (170)
张寿康教授小传	金运昌 (181)
父亲的事业与永远的怀念	陈朝达 (197)
编后记.....	(210)

学者之路^①

——商鸿逵教授传略

商 传 商 全^②

1983年11月10日凌晨，家父商鸿逵教授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家父生前执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是明清史学家。他去世的噩耗传出后，海内外的学者们纷纷拍来唁电，寄来唁函，对此表示了深切哀悼。

父亲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平时看上去身体很好，因此许多人都不相信，像他那样一位步履轻健、精神矍铄的老人，竟这样匆匆离去。消息传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他们专门派人到家中来探望，看看是否属实。厦门大学历史系收到讣告后，没有立即拍发唁电，而是决定先写信询问一下。辽宁省社科院的许多年轻朋友更清楚记得，就在一个月前父亲还曾同他们一起健步登上清东陵（福陵）的108级台阶。……他们怎能相信，从此再也看不到这位平易近人的老学者那神采奕奕的目光，听不到他在学术讨论会上的侃侃谈话，得不到他那循循善诱的教诲。

但这确是令人悲痛的事实。

① 本文录自《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

② 商 传：商鸿逵先生之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商 全：商鸿逵先生之子，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现赴美定居。

当我们陪着父亲的助手和研究生们走进他这间简朴的书房中清理遗物时，那里面除去书籍和少许几件衣物外，书桌上和书柜里堆积着大包的文稿。这就是父亲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他用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树立了治学和为人的楷模。我们仿佛看到，父亲那消瘦的身影依然在书架前翻看着书籍，依然在书案前撰写着论著，准备着讲课提纲。……他就像一头老牛，在辛勤的耕耘中默默地走过了自己一生的道路。

一、血气方刚

清光绪三十二年旧历腊月初九（1907年1月23日），父亲出生于保定府“马号”市场“华记”鞋店中。这给严冬中的小店增添了无限的温暖和喜悦。鞋匠出身的祖父盼望着父亲长大后继承家业，把店铺生意做好，祖母则一心希望他将来能够做官。

不管是做买卖也罢，当官也罢，书总是要读的。9岁那年，祖父揪着父亲的辫子把他送到私塾中，由私塾先生给起了大名叫商鸿逵，并且起了个号叫子上。

父亲从幼年起便以出众的聪敏好学赢得了先生的赞许。不识字的祖父总觉得能够学会算帐，能写幅对联就不错了，并不想无休止地花钱供父亲读书，曾经几次提出要退学，但遭到祖母的反对，而私塾先生也着实喜爱父亲的聪敏，宁肯不收钱，也要留下这个学生。由于著名的莲池书院的影响，保定私塾中保留了传统的朴实学风，这给予幼年的父亲极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私塾中学习了5年，14岁那年，他考入了保定崇真中学。这是一所法文学校，学习与生活的内容又都大不同于私塾。离开了旧式书案，走出了古老的书屋，他感觉自己来到了一个空气清新的庭院。“五四”运动后的北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一批革命先驱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在一些新式学校的青年学生中造成较大影响，把他们带入到更广阔的天地之间。

1924年秋天，父亲和法文学校的几名同学一起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平，考入了中法大学文科。在红叶似火的香山脚下，在风景幽雅的碧云寺中，父亲开始了大学的生活。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高年级同学。这位大同学对法国文学的精通而独到的见解，使他感到神往而钦佩，而那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的演讲，更深深地吸引住了他。这位受人尊敬的大同学就是当时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的陈毅。

和所有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样，父亲在陈毅领导下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他们向校当局要求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到附近乡村演讲，宣传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

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幸于北平逝世。灵柩停放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并定于4月2日移厝碧云寺。消息传到中法大学，悲痛之中的学生们组成挽灵队，承担了将灵柩从西山脚下挽入碧云寺安放到金刚宝座最高层的任务。当年的挽灵队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央是一块“中山不朽”的横匾。陈毅站在横匾右边，他身后的光头青年就是父亲。

1926年3月18日，刚刚从保定探家返校的父亲立即投

身到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的队伍中。身边同学中弹倒下，他背起受伤的同学跑进医院。解放后，章世钊先生曾专函向父亲询问当年学生请愿斗争的细节，可惜复函已无从查找了。

父亲在中法大学学习到1929年。按照规定，毕业考试前五名可以保送到法国留学。他满怀信心参加了考试，却名列第六，失去了保送留学的机会。他因此大病了一场，病愈后一面在中法大学图书馆寻到一份工作，一面下定决心去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

这一次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一个令人寂寞的秋天傍晚，他踱回公寓推开房门时，一个信封落在地上，里面是录取通知书。

二、弃文就史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是人才荟萃之地。著名学者刘半农、胡适、钱玄同、马衡、孟森等人都是研究所的导师。父亲在研究所的第一位导师是半农先生。半农先生是著名文学家，不仅擅长新旧诗歌、杂文，并且对文学史和语言文字音韵等都有高深造诣。父亲当时除从刘先生学习外，还被派往一家星云堂书店兼作经理。他晚年回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说道：“刘先生是我在大学读书时期最早、最亲近的老师。我的粗通翰墨，略解文艺，就是经他指导传授和熏陶影响的。”

半农先生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战将，但自从法国留学归来，地位日高，与旧日的战友鲁迅先生等人愈来愈无话可谈了，甚至父亲提出要去拜访一下鲁迅先生，也

遭到半农先生反对。这段时间里，父亲除去编印了《半农杂文》之外，自己也开始在上海《宇宙风》等杂志上发表《这一年》、《猫苑抄》之类杂文。然而更使他感兴趣的还是明清思想文化史，他先后撰写了《校〈桃花扇传奇〉》、《梅文鼎年谱》和《清初的理学界》，开始走上一条脱离政治的学术道路。

1932年冬季的一天，半农先生来到研究所，与父亲谈起清末名妓赛金花的事情。当时中法大学陈伯平教授正拟写一个法文本的《赛金花传》，于是半农先生提出先写一个中文的传。他们通过古琴专家郑颖孙介绍结识了赛金花，并约定每周请她谈两个半天，准备谈完后再搜集些材料，便动手撰写。谁知谈话尚未告结，半农先生即赴西北考察方言，染上“回归热”，回北平后多方医治无效，不久便去世了。

为了履行与书店签订的合同，父亲在悲痛之余撰成了《赛金花本事》。当时按照胡适先生的嘱咐，这本书只是如实记述了赛金花本人的回忆，略加史料补证。

书出版了，在社会上也颇引起一点轰动。不少地方邀父亲去演讲，上海影星胡蝶还来信请父亲商议拍影片，但父亲都一一谢绝了。导师突然去世，使初登文坛的父亲感到茫然，他需要去探寻一条新的治学之途。

父亲对明清史素感兴趣，所以当校方征求本人意见时，他便提出改从孟森先生研治明清史。这一年父亲26岁。

孟森先生是一位严肃而博学的老人，当时已经年近七旬。他清末曾留学日本，投身政治。民国后专力于明清史研究，著述甚丰。拜过教师后不久，父亲没有想到，这位老先生竟到公寓来看他了。询问过平日读书情况后，先生对父亲说：“我

看你每天除了去图书馆，就在这里用功，不必出去。至于上厕所……”他指了指门后的痰盂。这样严格的要求使父亲深感惊诧。

“文史不分家”，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种说法。但实际上，自从20至30年代西方研究方法引进中国后，文与史便逐渐分离开来。自从弃文就史以后，父亲也便不再去写那些小品文，而开始一字一句地去读《清实录》。

当时和父亲一起从师孟森先生的还有单士元、吴丰培、张鸿翔几位伯伯。每天早晨，他们随孟先生到北平图书馆，为先生备好笔墨，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孟先生正在编写《明元清系通纪》。每天到这里来读书的还有一个年轻人，也在抄录着《朝鲜李朝实录》，他就是后来著名的明史学家吴晗。在这座图书馆中，父亲还先后结识了赵万里、向达、启功、谢国桢诸先生。

1935年，父亲在读书基础上写成了《清代著作要籍年表》，不久又发表了《颜元传》，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和侥幸。父亲牢牢记住了先生的教诲，待到我们兄弟都步入史学研究大门时，他还经常用当年孟森先生的话教导我们：“我们做的学问要像石头般硬，碰到地上须是一个坑。”

几年埋头书屋的研究生生活是父亲一生治学的关键，但却也将他从广阔的社会天地之间推回到书丛桌案之前。他看不到那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政策的激动人心的斗争场面。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他竟然不知道这一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十年前那个刚刚从保定返校便投入“三·一八”请愿斗争的热血青年不见了，

这时的父亲成了一个埋头书屋不知天下大事的书生。

任何不过问政治的人，也同样无法摆脱政治风浪的冲击。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了。许多大学师生迁往内地。孟森先生因年事已高，留守北京大学，父亲亦随师留下。70岁高龄的孟森先生，目睹日军暴行，忧愤成疾，延至当年冬天去世，父亲的学业再次被迫中断。

这是北平沦陷后第一个令人难过的严冬，父亲在战火硝烟气味中埋葬了自己的老师。陈叔通先生为此专函代表学术界同仁向他表示了赞许和感谢。

父亲开始逐件清理孟森先生的遗物。在一次清卖旧书时，因有几本马列著作作为日特发现，他被带到日本宪兵队。幸亏碰上个翻译官爱好文史，又读过父亲的作品，才卖了人情，将他放出来。

亡国的耻辱，丧师的悲痛，撕扯着父亲的心，他陷入极度苦闷之中。

三、抉 择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父亲和所有沦陷区的人民一样，备尝了亡国的耻辱和生活的艰辛。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下的北平，仅靠大学留守处发给的微薄薪金难于维持全家人的生活，然而他又不肯出卖中国知识分子良心去换取高薪，去充当汉奸。于是他不得不为全家人衣食而奔波，学术研究也无从谈起了。

每当晚上坐在书案前，他眼前浮现的便是日本侵略军无

故殴打中国人的情景，是日本军官被击毙后疯狂搜捕的场面。……他无法安下心来翻看那些记述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荣辱兴衰的史籍，只感到那浓黑而沉重的夜幕仿佛要将这小屋连同他一起压垮。父亲在这令人窒息的黑暗中生活了整整八年。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终于以侵略者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结束了。八年艰苦抗战，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功绩和力量，但长期在政治上迷惘的父亲却错误地把国民党和蒋介石当作“抗日英雄”。就在这一年冬天，父亲加入了国民党。

人生道路的选择，有时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步之差，实际却往往是长期迷惘的必然结果。父亲在国民党内呆了两年多，这两年多时间里，他深深感觉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亲眼目睹了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们“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浪潮。在政治生活的风浪中，他体会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已经被歪曲和篡改了。作为当时北平宣传部门负责人，父亲必须为当局控制大学、破坏和镇压学生运动去宣传；作为一个信奉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大学教授，他又到处宣讲“民族、民权、民生”。他既遭到进步青年学生们的反对，同时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警告威胁。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困境之中，父亲逐渐清醒过来。

1947年底，国民党组织重新登记，父亲没有登记，他对友人们讲：“我看现在国民党人中，最像孙中山先生的只有宋庆龄女士。”他决心脱离国民党，开始对人生道路的新的抉择。

1948年春天，解放战场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民主派与国民党右派彻底分裂。父亲也在此时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即国民党

革命委员会前身之一)，并亲手为组织刻制了第一枚公章。在联络发展民革成员，到国民党军队内策反等秘密工作中，他开始了一种完全新鲜的政治生活。

晚上，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拿出民革内部秘密传阅的《新民主主义论》，打开第一页，“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鲜明而关键的问题立刻吸引住了他。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特点的精辟而准确的分析，对于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论述，都使父亲钦佩不已。这是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写成的著作。那时他就已经给中国的前途作出预见：“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杆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现在，这艘新中国的航船已经驶到身边，决不能再走错一步了。在黑暗中，父亲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晨曦。

朋友给他送来飞机票和船票，劝他去台湾，他拒绝了，他说：“国民党实在太腐朽了，没有任何前途，我不能再跟他们走了。”

1949年初，中共代表来到北平，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父亲异常兴奋，连夜为中共代表刻制印章，五人代表中三人印章都出自父亲之手。

十多年来动乱的生活结束了，父亲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新中国工作。他为自己曾走错路而感到愧对那些早年参加革命工作的故友和学生，他也为自己对新中国的诞生做得太少而深感不安，他愿意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周扬代表华北人民政府签发的聘书，被聘请为国立中法大学教授。

1949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时，父亲作为游行队伍领队之一，正置身于奋发狂欢的人流之中，走在新中国的光明大道之上。

四、读书最乐，康健是福

每个亲身经历过旧社会黑暗的爱国知识分子，也就更能体会到新中国的光明。他们身上虽然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但他们是真心将自己置身于新中国大厦的砖石之中的。

1950年10月，父亲由中法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不久，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爆发了。父亲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们一样，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以笔为武器，写书写文章，歌颂中朝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介绍中朝人民并肩抗击侵略者的历史，并把稿费捐给国家，购买飞机，支援前线。

1951年，父亲在《进步日报》上发表了《明代援朝最后胜利中的大将陈璘和邓子龙》一文，这篇文章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表扬。不久，天津《益世报》和香港报纸也先后全文转载。父亲还同张政烺先生合写了《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一书。书中写到明代援朝抗倭战斗时，父亲总是把明军和朝鲜军队称为“我军”，把日军称为“敌军”。他用如此鲜明的立场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他已经开始努力学着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了。

当时父亲在系里开讲了《清代学术史》和《中国近代人物研究》两门课。经历了十多年坎坷，他真心希望能安心从事教学与科研，但是事情却未尽如愿。

由于在干部忠诚老实运动中受到处理，从1953年起，父

亲被安排改讲《中国历史文选》。这是一种明显带有惩罚性的安排，但他并未计较，他以广博的学识，透辟生动的讲解，使学生们走入版本目录和史料学的大门。这门课成为学生们受益最深，最受他们欢迎的一门课。每当父亲面对着教室里的青年学生时，他便全部融于知识传授的乐趣之中。

1957年，父亲在讲授《中国历史文选》的同时，撰写并发表了《略论清初经济恢复和巩固的过程及其成就》，这篇颇见功力的论文得到了当时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推重。

在那些年月里，教学和科研工作总要不同程度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虽未受其难，但却总是处于一种无形的压力之下，大有动辄则咎之感。早在30年代，国外出版的《中国文化名人辞典》中就有了父亲的名字，而20年后，他却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受到如此待遇，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茫然和苦恼。

大约从这个时候起，父亲开始更进一步接受了老庄思想，希望以此来淡化各种压力和心理的不平衡，除此之外，便是拼命读书，把读书也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每周除上课外，其余时间都用来读书，他甚至因为阅读和整理大量史料而病倒在床。以后一年多时间，他不得不停止读书，因为一读书便感头晕难支。但是，在讲台上，父亲还在坚持给学生上课，指导毕业论文，他还同吴晗先生一起指导了一位苏联博士图诺娃。望着一批批的学生，抚着自己斑斑双鬓，父亲有时会百感交集。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了赠给同学们的一幅对联：“读书最乐，康健是福。”对于一位学者来说，如果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和健康的身体，他的学术生命也就真的结束了。

但是父亲还有另外一句格言：“搞学术研究就好像抽大